

论加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

贾根良

摘要：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约瑟夫·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些批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实践似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经济分析仍是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经济政策仍没有得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的应有重视。本文讨论了加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必要性，论证了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分支学科的必要性。本文认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目前和未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经济政策问题，运用“创造解释学”和政策范式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经济政策的得失进行探讨，挖掘并创新既往实践中蕴含但并非理论化的经济政策思想，直至为现实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 经济政策史 经济政策思想史 学科建设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提出“经济分析”应该成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熊彼特，2001）。这在经济思想史学界曾引起一场争论。本文第一部分首先界定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概念，并简述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第二部分概述经济思想史学家们针对熊彼特的观点对经济思想史学科主要研究对象的争论，提出笔者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笔者将论述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为经济思想史分支学科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 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jgliang97@126.com。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编号：16XNLG08）阶段性成果。本文完成于2020年3月，发表前又根据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做了修改，对匿名审稿人特此致谢。

第三部分扼要讨论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研究目的；第四部分则阐明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框架和意义。

一、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概念及其研究状况的历史发展

经济政策史，顾名思义就是经济政策的历史，但研究对象并非只是具体的经济政策，它还涉及经济史中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结构、制度安排、经济发展战略、政策能力以及经济政策的历史变迁等诸多方面的研究。经济政策思想史是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中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思想、经济理论、意识形态和哲学观的研究。张林等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视作同一件事情，认为其研究内容应该主要包括经济思想、经济方略和经济政策（张林、周济民，2020）。在笔者看来，他们所说的“经济方略”就是笔者所说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使用“经济政策史”这个术语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他在1837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中，三十五章中有六章专门讨论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的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美国和俄国的经济政策史（李斯特，1997）。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李斯特就用了约占全书五分之二篇幅讨论了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国富国穷的经济史，特别是经济政策史（李斯特，1961）。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是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分开处理的，笔者沿袭了这种处理办法。在笔者看来，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分开处理更有利于这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虽然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联系非常密切，但毕竟处理的是不同的事情。经济政策史主要处理的是经济政策史的结构与变迁，包括影响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制度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制定政策的行政机构及其政策能力、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政策效果评估等，以便为人们借鉴经济史中经济政策的得失提供更深邃的历史分析；而经济政策思想史则是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受到哪些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影响的研究，也包括对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世界观、人生经历、意识形态、阶级立场和潜意识结构的研究，其目的之一是揭示经济思想史中两大思想传统对一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何等影响、

有哪些经验教训需要借鉴。^①

在现代学者中，挪威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Erik S. Reinert）最早提出要发展“经济政策史”的子学科，并付诸实践。赖纳特指出，“由于没有一个诸如‘经济政策史’的学术子学科，欧洲和北美的工业化强国现在似乎都对它们自己的过去形成了错误的看法，忘记了国家在带领它们走上脱离贫困之路时所发挥的作用”（赖纳特，2005：225）。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赖纳特在爱沙尼亚塔林理工大学专门开设了“经济思想史脉络中的经济政策史”课程。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的成名作《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张夏准，2007）实际上就是一本从经济政策史角度对“华盛顿共识”进行批判的通俗读物。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赖纳特出版有关“经济政策史”作为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一门交叉学科应该如何被建设的论著。

虽然没有使用“经济政策史”这个术语，但《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马赛厄斯·波拉德，2004）实际上就是一部对美欧国家经济政策史不大全面的研究专集。威廉·莱特温（William Letwin）出版了《美国经济政策：从革命到“新政”》（Letwin，2007）。最近的一本专著则是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思想史教授劳伦斯·怀特（Lawrence H. White）出版的《经济思想的大冲突：过去100年的重大经济政策争论与实验》（White，2012）。此外，最近几年还出版了不少从经济政策史方面对罗斯福新政和货币战争等问题进行研究的专著，笔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经济史学界对中国经济政策史和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也比较早。已出版的专著计有：上海社会科学院马伯煌主编的《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朱英、石柏林合著的《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1998），刘勉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发展史》（2001）等。

近年来，在外国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方面，美国杜克大学华人学者高柏教授的成名作《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高柏，2008）是一本优秀的著作。因此，笔者在这里要做一点评。高柏教授的这本著作首先研究的是，政治家、官僚阶层等非经济学家较能普遍接受的经济

^① 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这种研究有时要采取张林教授提倡的“事件”研究方法（张林，2007），或者某些研究属于笔者讨论的“经济学学界史”的内容（贾根良、兰无双，2017，2019）。

观念和经济学家们的经济理论，对日本这一时期实际的产业政策制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将经济观念放在了日本产业政策分析的核心位置。在这本著作中，高柏（2008：13）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没有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任何显著影响，所以他不得不通过对1931—1965年间相关的日本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一般公众就重要政策问题所进行的政治争论进行研究，探寻究竟是哪些经济思想对日本崛起时期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和直接的影响。结果他发现，在政策制定中产生的“实践派经济学”对日本产业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并把这种“实践派经济学”的历史渊源追溯到了德国历史学派。

高柏（2008：51）指出，“日本经济发展的历程，显示了与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截然不同的另一条工业化道路；这种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对西方国家巨大的经济挑战。然而，来自日本的意义更为深远的挑战却是思想上的，因为日本发展主义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的另一种传统。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历史学派，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传统分庭抗礼”。但如果人们了解笔者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赖纳特、贾根良，2007a，2007b），^①那么，日本发展主义所代表的经济思想史上的这种传统可以远溯至重商主义经济学，而高柏教授所指的德国历史学派只是其后裔之一。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道路和历程也并非像高柏所认为的与盎格鲁—撒克逊式道路不同，英国崛起和美国保护主义时期的发展道路是日本模式的老师和先驱。^②笔者将日本发展主义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提出了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及加州学派“大分流”相当不同的一个概念——“中日大分流”（贾根良，2015），对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提出了新的解释。

二、经济思想史学界有关经济思想史研究 主要对象的争论

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一直受到经济思想史家们对其学科研

^① 《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下卷是出版于2007年，专门为中国读者选编的相关文献的著作。该著作由贾根良邀请赖纳特共同主编，贾根良等翻译，中文书名由贾根良拟定。“演化发展经济学”这一术语为贾根良所创造，用于他此前所译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

^② 请参看笔者的相关研究论文（贾根良，2017）和专著（贾根良等，2017）。

究对象认识的制约，这在熊彼特的论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虽然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珀尔曼（Mark Perlman）将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称作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三大权威性著作之一（Perlman, 1986），但它本身并不是一部被熊彼特狭义地定义为“经济思想史”的著作。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①是在其去世后由其夫人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编辑出版的，正如伊丽莎白·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编者绪论》中指出的，在熊彼特撰写《经济分析史》的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强调这是一部经济分析史而不是一部经济思想史”（熊彼特，2009：6）。《经济分析史》主要研究的不是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而是经济分析工具或者说经济分析手段发展的历史。

熊彼特所定义的“经济思想史”实际上是本文所说的“经济政策思想史”的一部分。熊彼特对“经济学史——经济分析史——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史以及经济思想史”的概念进行了如下区分，“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熊彼特，2001：69、17），而所谓“政治经济学体系”指的是“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熊彼特，2001：69）；“经济思想”则是指“浮现于公众头脑中，或者可以归因于立法与行政官员的有关经济政策上的观念”（熊彼特，2009：6）。英国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W. Hutchison）指出，在通常情况下，“经济思想”是指囊括了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问题、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务的一切思考和讨论；而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所说的“经济思想”指的只是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意见和看法。因而熊彼特所定义的“经济思想史”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思想史并不是一回事（哈奇森，1992：359—360），它实际上指的就是笔者所定义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中由非经济学家们不成体系地提出的有关经济政策的思想史（贾根良，2010）。实际上，经济政策思想史也包括了经济学家们对“一整套经济政策阐述”的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思想史。

^① 商务印书馆于2009年出版了由朱泱、孙鸿敞、李宏、陈锡龄所译的此书的第一卷，将英文版编者姓名译为伊丽莎白·波蒂·熊彼特。

（一）对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批评

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指出，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他自己的偏好，异于在他之前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常规做法。丹麦经济学家安德森（2013：254）指出，“熊彼特在对经济学的描述中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改变，……这个改变就是他放弃了经济思想史强调政策问题的常规做法”。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对熊彼特偏好经济分析史而贬低学说史提出了批评，他指出当熊彼特为思想史辩护时，想的是经济“分析”史。可是，后来几乎所有为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都是关于经济“学说”史的，这包括：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的、哲学的和政治的先入之见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学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的国际传播，以及如何把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问题上（Blaug, 2001）。也有研究经济思想史的专家指出，熊彼特专注于经济分析史是其一贯的偏好。熊彼特在1914年出版了德文版著作《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该书在1954年被翻译为英文版（Schumpeter, 1954）。奥雷斯特·波佩斯库（Oreste Popescu）通过梳理经济思想史学史发现，在熊彼特出版该书之前，带有批判性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的研究对象都是“学说”（即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总和），专门将理论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撰写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做法正是由熊彼特的《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所开创的（Popescu, 1964）。作为《经济学说与方法：史略》的扩充版本，《经济分析史》很自然地延续了这种做法。

贾子尧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熊彼特倾向于赞扬“为科学而科学”的经济学家，而贬低以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为目的的经济学家，是其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贾子尧，2018）。贾子尧引用理查森（G. B. Richardson）的研究说明了这一问题，理查森认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被熊彼特按照他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动机和目的分为了大致两类：一类经济学家出于纯粹的科学好奇心，致力于把尽可能多的个别现象概括在简洁的、统一的一般性原理之下，尽可能地实现“思维的经济”；另一类经济学家则为了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试图通过他们的理论将那些对实际目的至关重要的经济关系凸显出来，从而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理查森指出：熊彼特倾向于赞扬第一类经济学家，如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约翰·海因里希·冯·屠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ünen）、安

托万·奥古斯丁·古诺 (Antoine Augustin Cournot) 等; 批评和贬低第二类经济学家, 如大卫·李嘉图 (David Ricardo)、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 等 (Richardson, 1955)。在笔者看来, 熊彼特的这种划分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 例如, 将瓦尔拉斯、屠能和古诺划为第一类经济学家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只将马克思和凯恩斯划为其中某一类就是不成立了, 因为他们两人同时具有这两类经济学家的特点。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出版后, 针对熊彼特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问题, 许多经济思想史学家提出了批评。熊彼特认为, 他所定义的经济思想, 即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观点和看法, “与其说属于经济史的范围, 毋宁说属于经济史的范围” (熊彼特, 2001: 89)。对此, 鲍勃·科茨 (A. W. Bob Coats) 指出, 熊彼特明确地表示过对经济政策史没有任何兴趣 (Coats, 1993: 1)。针对熊彼特将非经济学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归于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做法, 哈奇森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领域的分隔和成见进一步提出了批评: 经济思想史学家对经济思想史感兴趣通常不是由于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是出于思想观念本身的吸引力; 而经济史学家如果对历史上的经济思想感兴趣, 则一定是因为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实际行动和政策制定 (哈奇森, 1992: 351—352)。

针对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史两个学科对经济政策的不同态度, 钟祥财教授指出, 经济政策思想史是联系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重要纽带, “这种纽带作用集中体现在两种关系上, 一是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一是个人和阶级的关系” (钟祥财, 2015)。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经济政策史的深入研究, 因此, 笔者一直是将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连在一起加以讨论的, 并将之看作是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两个学科的交叉分支学科。

(二) 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无进步可言的吗?

熊彼特对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采取了截然对立的评价态度。在他看来, 经济分析是客观中立的, 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长河中, 经济分析是存在进步的; 而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是其时代和阶级利益的产物, 在人类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上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首先, 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定义为独立于环境因素特别是独立于哲学和

意识形态影响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历史，而经济政策是哲学观和意识形态的产物。熊彼特承认通常所说的“经济思想”的确受到了经济学家所持的哲学观点的影响。Chalk（1958）指出，熊彼特觉得当经济学家处理本质上是规范性的问题时，哲学常常会对他们产生影响。Meek（1957）总结道：在熊彼特看来，“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无疑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污染，但幸好某些重要的意义上，“经济分析”可以被证明相对而言是没有受到损害的。

其次，熊彼特对理论和政策、经济分析与经济政策思想采取了截然可分的态度，声称只有经济分析才有进步可言，而包括他所谓的经济思想和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内的经济政策思想则完全是某一历史时期和不同环境的产物，谈论它们是否取得了进步没有客观意义（熊彼特，2001：71—72）。熊彼特明确地指出，“在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问题上，进步这个名词是没有客观意义的，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熊彼特，2001：72）。总之，在熊彼特看来，在经济思想史中，只有分析工具存在着进步，人类在认识经济世界的思想上是不存在进步的，因此，经济政策思想也不存在进步。

我国学者巫宝三先生针对熊彼特将经济政策思想视作阶级偏见和经济政策思想不存在优劣好坏之分、不存在进步的观点提出了批评。首先，熊彼特认为，“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经济思想”表现的是各个时代和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于其他时代和地区没有真实性，相互之间没有孰优孰劣可言；而“经济分析”是科学的，是可以比较的，是有优劣好坏之分的。巫宝三先生反驳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历史上的许多经济学说和政策方案的提出，都以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经济情况为根据”（巫宝三，2003：79），并不能仅仅将之视为偏见。其次，熊彼特认为，“分析工作的发展，无论受到市场上各种利益与态度的干扰有多大，都显示出一种特性，完全不存在于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之中”（熊彼特，2001：71）。针对这种观点，巫宝三先生也明确地表示异议，他指出：“经济分析方法与经济思想和政策虽然有不同之处，但终极地说，都不能脱离具体时代和具体社会条件。”（巫宝三，2003：79）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熊彼特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我们首先简述他的基本观点。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或者说“经济分析工具”的产生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客观的、绝对的，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既不受

“经济学家所持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也不受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发展中边际代替率概念替代比较旧的边际效用概念的思想史，熊彼特试图说明从边际效用价值论过渡到以边际代替率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论，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因为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同等地与任何意识形态并行不悖（熊彼特，2001：79）。

熊彼特的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际代替率是经济学边际革命的产物，正如 Mirowski（1984）等许多经济思想史家的研究所表明的，边际革命是深受经典物理学机械世界观和静态宇宙观影响的产物。边际革命是新古典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基础，因此，Meek（1957）认为，熊彼特所说的从边际效用价值论过渡到以边际代替率概念为基础的价值论，作为经济理论走向一般均衡理论的一个环节，这种理论上的转变反映了经济学正朝着脱离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式主义方向发展，而不是在揭示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方向上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理论兴趣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上绝不是中立的，它根源于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这就是道格拉斯·多德（Douglas Dowd）所说的边际革命和新古典经济学是回避棘手的和引发尖锐社会冲突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的产物，“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并依然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羞布……新古典经济学的推动力起初部分来源于意识形态领域（抵制马克思在社会压力不断增长的时期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将其分析与历史分析脱钩，成为‘静态’理论，为在现状之内运转和维持现状服务”（多德，2008：111—113）。其次，从哲学角度来说，正如当代科学哲学家诺伍德·罗素·汉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提出的“观察渗透理论”（汉森，1988），在这里，所谓的“理论”是指关于世界的信念和世界观。在经济学中，经济分析工具的产生和发展就像经济政策思想一样从根本上来说是经济学家的哲学本体论的产物，而这种本体论假定绝不是价值中立或意识形态中立的。

三、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及其研究目的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思想史学界曾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价值进行过辩护性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唐纳德·戈登（Donald F. Gordon）认为，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的基本模型达成了一致意见，这使得经济学更接近于自

然科学，其教学基本上可以依靠教科书：经济理论非常像一门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与其他常规科学一样，将它的历史作为专业训练的一部分是没有必要的，而在那些没有一致意见的领域，人们自然会求助于该领域中的经典。因此，戈登将经济分析史与经济学说史（即有关经济政策的看法的历史，包括它们与政治、社会和哲学的联系）区别开来，并提出经济思想史学家应该更偏重于后者。在他看来，经济思想史学界在经济政策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相反有极大的分歧（Gordon, 1965），所以经济学说史对于经济政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笔者看来，戈登虽然正确理解了经济政策及其学说，也就是笔者所说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应该成为与经济分析史相并列甚至比之更重要的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对象。但是，他将经济学类比于自然科学是不正确的，他认为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的基本模型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在他说这种话的时候，世界上一直存在着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持异议的非主流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的多元主义史学观和经济思想史中存在着两大思想传统的原因。

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提出了许多批评，但这些批评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实践似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不只是经济思想史教科书的编写，而且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仍是以经济分析史为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经济理论史为主，关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讨论很少见。

在这方面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布劳格，2009），这基本上仍是一本以经济理论与分析工具为主的经济理论史著作，而且与他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反对者”相悖的是，这本著作主要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理性重建”，而相当大范围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并没有被论及（贾根良、李黎力，2010）。第二个例子是英格丽德·H. 里马（Ingrid H. Rima）直接将其编写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教科书命名为《经济分析史》。^①这本教科书自1967年首次出版以来，五十多年里再版了六次，正如作者在该教科书《前言》里所说的，

^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由陈勇勤、刘星所译的此书第七版，将作者姓名译为英格里德·H. 里马。

它是“一本关于经济学分析工具发展的书”（里马，2016：1），而不是一本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教科书。当然，笔者并不是说经济分析史不重要，在笔者看来，它应该与“经济政策思想史”“经济学学界史”一起构成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的主要领域，笔者只是说经济学家们仍很少关注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虽然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对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贬低经济政策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做法一直存在着批评，但经济思想史学界对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的发展问题，仍少有探讨。目前，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还是后起的经济学学界史和经济思想知识史，其注意力都是集中在经济理论本身，特别是集中在较为系统的理论学说的形成、发展和变革上，很少去更多地关注政策问题，它对经济思想如何影响实践、如何影响政策制定以及从政策效果上反思这些思想的研究始终都比较缺乏，这样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难以为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提供借鉴。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应该发展一种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交叉研究的分支学科领域——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贾根良，2010）。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亟待处理的具体经济政策问题，运用“创造解释学”和政策范式的研究方法，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相关经济政策的得失进行探讨，挖掘其经济政策实践中蕴含但未见理论化的经济政策思想，直至对现实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一系列具体的建议。传统经济思想史研究主要关心的是过去的经济学家们基于其理论提出的经济政策观点，针对这种研究范式，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反其道而行之，它主要是从当时历史环境中实际经济政策效果和当前借鉴的角度，讨论并评价过去经济学家的经济政策观点。

笔者在2010年提出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纲领致力于将“创造解释学”的新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和“政策范式”的研究框架引入到经济思想史、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创造解释学”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是中国哲学史家傅伟勋先生在攻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时所独创的。在他看来，思想史研究的目的是我们不仅要“历史性重建”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他真正的意谓是什么以及他可能还要说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问：假定这些作者今天还活着，他们愿意根据新的情况来修正或扬弃已有的说法吗？他们会怎样进行修正或扬弃？

因为原作者已不在人世，因此，只有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才能千方百计为其作答（傅伟勋，1989：51—52）。但是，创造型的解释学家不仅要替原思想家作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通过发现原思想家的分析框架、方法和理论的不足，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理论，甚至开创新学派（贾根良，2004，2010）。

“新经济思想史”也致力于将政策范式的研究框架引入到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之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策范式概念在公共政策、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中开始兴起，彼得·霍尔（Peter A. Hall）1993年在他经典论文中提出的政策范式理论对其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Hall，1993）。那么，如何定义政策范式呢？按照卡森（M. Carson）的看法，所谓政策范式是由特定参与者的共同体共享的认知模式，它有助于解决问题（Carson，2004）；同样地，弗兰克·鲍姆加特纳（Frank R. Baumgartner）指出，当思想被整个政策共同体广泛分享时，这种思想就可以被称为范式（Baumgartner，2014）。因此，Daigneault（2014）特将其定义为“一套能够对公共政策内容产生影响的连贯而完善的政策理念”。^①

四、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的研究内容、框架和意义

目前，作为学科建设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笔者在这里首先讨论一下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然后再探讨研究的意义。

一般说来，该分支学科所研究的经济政策史和思想史应该包括有关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具体制度设计（内包含了经济政策内容）和各种具体经济政策的历史及其蕴含的经济思想和受到哪些经济思想影响的历史研究，也包括《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工业经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中所讨论的作为社会政策的劳工政策史以及对其思想史的研究。具体的经济政策史主要涉及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政策的历史，如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史、产业政策史、科技政策史、财政税收政策史、货币与金融政策史、

^① 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可参看丁涛和贾根良（2018）。

就业政策史、环境和能源政策史、农业政策史、宏观经济政策史等。

一个初步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框架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经济政策原理，经济政策与经济理论的关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个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未来学科发展新方向的探讨，影响经济政策制定的各种因素，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和经济政策实际效果的评估，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一体化研究的框架和基本理论，等等。

在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框架的问题上，张林教授等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史研究需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的观点具有重要借鉴价值。这两方面的关系，“一是经济政策史与经济史材料的关系。经济政策史研究需要大量经济史材料的支撑，这些材料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因为，我们把经济政策史上的教训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从而可以客观面对这些材料，避免了对历史的‘任意打扮’。二是经济政策史与政策评估的关系。经济政策史要研究政策效果，自然离不开政策评估，但政策史视角下的政策评估更加注重的是长期影响，不能简单地从一时一地的影响来评判经济政策的效果”（张林、周济民，2020）。笔者赞同他们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对于一般性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来说，研究的重点也应该包括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来说更是这样。当然，这些研究都应该是在国际历史比较中进行的。

作为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意义就在于“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司马光，1990：935）的重大主题，效法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精神，为我国当前和不远将来的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历史经验以供借鉴，甚至直接提供相关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其研究意义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支配经济政策的某种思想的持久性影响有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是“经济政策史与经济政策思想史”研究之所以重要的表现之一。美国自建国以来的东亚政策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惊人的一致性就说明了这一问题。通过对美国政治经济史和外交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40年代席卷亚洲的大变动之前，美国的东亚政策一直受到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原则的支配；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的大变动中，政策的变化也是表面上的。今天，美国对于东亚的政策思考明显是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准将和威廉·亨利·苏厄

德 (William Henry Seward) 等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如果了解美国在 19 世纪下半叶“分而治之”的东亚政策, 我们就会发现 21 世纪初美国的东亚政策, 特别是对华和对日政策与那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对支配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研究, 不仅可以洞悉美国崛起和获取全球霸权的战略及其因果机制, 而且, 对于观察美国目前东亚政策的制定, 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制定, 也将提供不可多得的历史视角, 其意义是只局限于对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 针对我国目前和今后半个世纪经济政策制定所面临的挑战, 对目前发达国家在经济崛起时期 (或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时期) 以及从崛起到国际领先地位最终巩固时期的“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 不仅可以使我国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少走弯路, 避免重大错误, 而且还可以直接为重大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灵感。例如, 笔者通过对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的对外经济政策史进行研究, 总结出了一种带有历史规律性的“不对称全球化战略”: 凡是成功崛起的国家无一不是在对发达的核心国实施保护主义, 与其处于半隔绝、半脱钩状态 (浅度全球化), 同时和比自己落后的国家建立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 (深度全球化) 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崛起的 (贾根良, 2018)。

再次, 经济政策及其反映的经济思想, 较之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能够更具体和更直接地作用于现实, 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最直接的因果效应。同样, 了解和深入研究发达国家崛起 (包括英美两国获取和巩固其霸权地位) 的经济政策史以及形成这种经济政策思想的前因后果等, 较之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梳理而成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来说, 虽然抽象程度较低一些, 但对中国崛起及其政策制定具有更多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最后, 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 扩大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研究范围, 对经济思想史学科具有重要的学科建设意义。笔者曾讨论过目前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两大缺陷: 一是偏重于经济理论, 忽视那些对经济政策制定产生过重大影响却未得到明确阐释的经济思想, 这种研究导向忽视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削弱了经济思想史研究对解决当代经济发展问题的启发价值; 二是偏重于对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学派传承的研究, 而对于经济思想是如何影响经济政策制定及其结果缺乏研究。例

如，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都讲授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际分工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但是，可以说没有一本教科书讲述这些理论是如何影响英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过程的，也没有对其影响做出过评价，这就使得学生在学习和评价经济思想史上的经济学说时无法与当时的历史实际相结合。我们知道，尽管经济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所激发的，但当这些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时候，它就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并重塑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因此，经济思想史研究还应该能够解释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制定、经济制度变革和其他经济活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一任务，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思想史学科中创建“经济政策史”和“经济政策思想史”子学科（贾根良，2010，2016）。

参考文献：

- 安德森，埃斯本，2013，《约瑟夫·熊彼特》，苏军译，华夏出版社。
- 布劳格，马克，2009，《经济理论的回顾》，姚开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丁涛、贾根良，2018，《流行的经济学思潮与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辨别力——基于18世纪英法〈伊甸条约〉的案例研究与当代启示》，《经济纵横》第4期。
- 多德，道格拉斯，2008，《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傅伟勋，1989，《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高柏，2008，《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安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哈奇森，特伦斯·W.，1992，《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李小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汉森，N. R.，1988，《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探究》，邢新力、周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贾根良，2004，《演化经济学——经济学革命的策源地》，山西人民出版社。
- 贾根良，2010，《“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 贾根良，2015，《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贾根良教授访谈录》，《管理学刊》第2期。
- 贾根良，2016，《打造中国的经济思想史学派》，《中国社会科学报》1月12日。
- 贾根良，2017，《重商主义、工业文化的诞生与英国工业革命》，载彭南生、严鹏主编《工业文化研究》第1辑（总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贾根良，2018，《不对称全球化：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南国学术》第4期。

- 贾根良、兰无双, 2017, 《经济学学界史: 经济思想史新的研究对象与目的》, 《教学与研究》第6期。
- 贾根良、兰无双, 2019, 《经济学学界史的问题意识、方法论与研究意义》, 《经济学家》第1期。
- 贾根良、李黎力, 2010, 《浅议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兼评马克·布劳格的〈经济理论的回顾〉》, 《当代经济研究》第4期。
- 贾根良等, 2017, 《美国学派与美国19世纪内需主导型工业化道路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贾子尧, 2018, 《熊彼特经济思想史学理论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 赖纳特, 埃里克·S., 2005, 《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载杰弗里·M. 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 关键性概念》, 贾根良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赖纳特, 埃里克·S.、贾根良主编, 2007a, 《穷国的国富论: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 贾根良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 赖纳特, 埃里克·S.、贾根良主编, 2007b, 《穷国的国富论: 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 贾根良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1961,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陈万煦译, 商务印书馆。
-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1997, 《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 杨春学译, 商务印书馆。
- 里马, 英格里德·H., 2016, 《经济分析史》, 陈勇勤、刘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刘魁玉主编, 2001,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发展史》, 湖南人民出版社。
- 马伯煌主编, 1993, 《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 云南人民出版社。
- 马赛厄斯, 彼得、悉尼·波拉德主编, 2004,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8卷《工业经济: 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发展》, 王宏伟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司马光, 1990, 《进书表》, 载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第4册, 岳麓书社。
- 巫宝三, 2003, 《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巫宝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熊彼特, 伊丽莎白·波蒂, 2009, 《经济分析史·编者绪论》, 载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 朱泱等译, 商务印书馆。
- 熊彼特, 约瑟夫, 2001, 《经济分析史》第1卷, 朱泱等译, 商务印书馆。
- 张林, 2007, 《经济思想史事件研究的价值和方法》, 载顾海良、颜鹏飞主编《经济思想史评论》第2辑(总第2辑), 经济科学出版社。
- 张林、周济民, 202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书写新范式》, 《思想战线》第4期。
- 张夏准, 2007, 《富国陷阱: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肖炼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钟祥财, 2015, 《关于经济史学的几个问题》, 《上海经济研究》第1期。
- 朱英、石柏林, 1998, 《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 湖北人民出版社。
- Baumgartner, Frank R. 2014. "Ideas, Paradigms and Confusion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 Policy* 21 (3): 475 – 480.
- Blaug, Mark. 2001.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5 (1): 145 – 164.
- Carson, M. 2004. *From Common Market to Social Europe? Paradigm Shift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uropean Union Policy on Food, Asbestos and Chemicals, and Gender Equality*. Stockholm: Stockholm University.
- Chalk, Alfred F. 1958. “Schumpeter’s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 of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24 (3): 271 – 282.
- Coats, A. W. 1993. *The Sociology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ume II*.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Daigneault, Pierre-Marc. 2014. “Puzzling about Policy Paradigms: Precision and Progres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1 (3): 481 – 484.
- Gordon, Donald F. 1965. “The Rol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conomic Theor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5 (1/2): 119 – 127.
- Hall, Peter A.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 (3): 275 – 296.
- Letwin, William. 2007.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New Deal*. New Brunswick: Aldine Transaction.
- Meek, R. L. 1957. “Is Economics Biased? A Heretical View of a Leading Thesis in Schumpeter’s History.” *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 (1): 1 – 17.
- Mirowski, Philip. 1984. “Physics and the ‘Marginalist Revolution’ .”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8 (4): 361 – 379.
- Perlman, Mark. 1986. “Perceptions of our Discipline: Three Magisterial Treatments of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of Economics Society Bulletin* 7 (2): 9 – 28.
- Popescu, O. 1964,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 Thought: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8 (1): 168 – 209.
- Richardson, G. B. 1955. “Schumpeter’s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7 (2): 136 – 150.
- Schumpeter, Joseph. 1954. *Economic Doctrine and Method: An Historical Sketch*, trans. by R. Ar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Lawrence H. 2012. *The Clash of Economic Ideas: The Great Policy Debates and Experiments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iscussion on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Thought

Jia Genl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historians of economic thought have made a lot of criticisms on Schumpeter's belittling the practice of taking economic polic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se criticisms do not seem t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actic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conomic analysis is still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economic policy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by historians of economic though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thought, and demonstrates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thought as a branch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main purpose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thought is to solve the necessary economic polic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reative hermeneutics" and policy paradigm,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thought is committed to explore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economic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historical periods, to excavate and innovate the economic policy thoughts contained in past practice but not theorized so that a series of concrete suggestions can be provided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alistic economic policies.

Keywords: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History of Economic Policy Thought,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B20, N01, P16

(责任编辑:倪诗妆)